在殖民地博物館展示歷史：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例（1908-1945）

王飛仙*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日本殖民情境下西方博物館的初次嘗試，本文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對象，關注殖民地博物館如何展示殖民地，試圖爲相關議題提供初步討論。新博物館學對傳統博物館加以檢討，注重博物館作爲一社會空間權力與儀式運作的情形；而展示爲博物館重大任務，亦非單純陳列展品，爲有意識安排展品於特殊敘事大綱。利用新博物館學的成果與切入點，本文藉由建立博物館、博物館建築與博物館內之展示三個層面討論日本殖民政府展示殖民成果的方法，以歷史部爲主，討論該部重要展示品背後隱藏著總督府史觀下的台灣史大綱，並與日治時期台灣史研究相比對，發覺該部展示並非以展示藏品爲目的，而是藉展示傳達日本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合法性，與自然史或人類學部門之展示不同，非唯表現對殖民地物質之支配，尚顯示對於殖民地的過去詮釋的權力。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C.E.P.S.

關鍵字：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台灣史研究、展示、殖民統治

一、

西元 1908 年 10 月底，由於縱貫鐵路通車及閑院公載人親王夫婦來訪，盛大的共進會展覽、教育品展覽會與各種慶祝活動在台灣同時展開，[1]這波展覽風潮中，性質最爲特出的應屬 25 日於原彩票局開幕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以下簡稱台灣總督府博物館）[2]。

據館員回憶，原先的構想僅是在這波展覽的風潮中，舉辦一個展覽會，因場所與時機都適合，在相關人士勸說下，總督府始同意成立博物館，藉此機會廣爲宣傳台灣的情形。[3]如此看來博物館的設立似乎有點意外，但在此之前，總督府早有在台灣建立博物館的計畫：1906 年在後藤新平去職前夕，台北成立「故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物建築委員會」時，即已決定該建築爲「博物館」。[4]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可說是西方定義的「博物館」在日本殖民地上的首次嘗試，[5]近年來博物館與殖民主義間的關連性漸受重視，歐美已有不少討論殖民地博物館中的自然史與人類學之相關研究，台灣的學者亦開始注意台灣總

---

[1] 《台灣日日新報》，1908年10月23-26日。

[2] 日治期間，由於所屬機關改變，博物館的全名常有更動，但時人多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稱之。

[3] 素木得一，〈博物館創設當時を故みて〉收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台灣博物館協會，1939），頁377。森丑之助，〈台北博物館的回憶〉（中譯），收入李子寧編，《台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週年專刊》（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1999），頁264-269。這篇寫於1925的文章對如何由展覽的一部份變成博物館有詳細說明。

[4] 台灣慣習研究會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台灣慣習記事》（中譯本）（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初版印行於1907），頁76。

[5] 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例〉，《台灣省立博物館年刊》，第40卷（台北：台灣省立博物館，1997），頁242。

C.E.P.S.

督府博物館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意義，李子寧的〈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例〉，對於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成立背景及發展過程，與日本殖民統治間的關係，已提供我們初步的成果。

李子寧認爲台灣建立一座博物館的內外條件，於兒玉、後藤主政時已臻成熟，在其主政八年間奠定了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基礎，並開始將台灣視爲日本殖民地的櫥窗，介紹新領土及經營殖民地的成績。博物館建立前，早有若干相似的活動如慣習調查、展覽會、共進會或商品陳列館等，一方面收集台灣相關資訊；一方面宣傳日本治台成績。有這些相關調查與展覽鋪路，而使一座可以「向本國介紹新領土真相，向世界誇揚殖民地經營成功」的博物館終能於 1908 年開幕。[6]

他將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發展分爲兩個時期：殖產局時期（1908-1920）博物館發展的主軸爲標本收集與自然史研究，注重對台灣真相的收集與分析，以進一步能利用台灣的資源，該時期迅速增加的收藏品呈現出日本統治下台灣的「真相」：台灣生物世界的多樣、自然資源的豐沛與獨特、歷史民族的複雜與異國情調，以及在日本統治下的進步繁榮。第二個時期爲 1920-1945 年，注重社會教育的時期，由於編制改變與預算減少，標本無法如以往快速增加，陷入發展停滯的困境，於是博物館轉型爲大眾社會教育的機構，成立台灣博物館協會，發行通俗刊物《科學の台灣》，舉辦各種演講與活動（如採集標本），與學校教學合作，並自 1933 年起舉辦「台灣博物館週」的活動。[7]

該研究及稍後其主編之《台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週年專刊（1908-1998）》，亦對博物館之展覽品、參觀人數、活動、學術論文等，做了整理與統計，有助於後續研究之展開。

1980 年代以降，受到後現代思潮影響而出現的新博物館學（The New

[6] 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例〉，頁245。
[7] 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例〉，頁245-258。

C.E.P.S.

Museology），[8]對博物館與博物館內之收藏與展示加以檢討，注重博物館及所屬政治社會情境間之互動，視博物館爲人爲的特殊社會空間或夢幻空間（Dream Space），利用一定的方法與儀式，使博物館及其展示成爲世俗知識的殿堂，能強化訊息傳遞給參觀的觀眾。[9]

Carol Duncan 的《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爲新博物館學之重要著作，她探討十八世紀以來西歐及美國美術館形成的過程，視博物館整體爲一個由特殊儀式情節組成的特殊場域，[10]在建築、規則、贊助者、收藏與展示的背後，博物館實是複雜的政治權力、階級利益、種族性別等因素交錯運作的場所，觀眾於參觀時，亦非單純地觀覽，而是參與了一個價值再確認的演出。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雖是一公共博物館，但其建立與殖民統治密不可分，與歐美的公共博物館受市民階層影響的狀況不大相同，受政治影響的程度遠勝於 Duncan 所討論的案例；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建立之一大要務爲展示殖民地台灣，其展示可視爲支配博物館的總督府所欲展示的面向，展示的對象包含了世界各國、內地人與本島人。當博物館本身被視爲文明進步或重要城市的象徵時，[11]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建立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此舉，即是一種展示：向世界展示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已能支配其殖民地，並已具能

---

[8] 新博物館學相對於注重博物館運作，視博物館爲知識殿堂的傳統博物館學研究，視博物館爲一個社會機構、政治場域，關切博物館中知識、文化、政治等因素彼此的運作，並對博物館收藏展示的真實與權威加以懷疑反省。可參見Deirdre C. Stam , “The Informed Mus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Museology’ for Museum Practice,”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vol. 12（1993）, pp. 267-283, 及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空間展望》（台北：南天書局，1999），頁1-3。

[9] Gaynor Kavanagh, “Making Histories, Making Memories,” *in Making Histories in Museums*, ed., Gaynor Kavanagh （London: Lecester Univ. Press, 1996）,p. 2.

[10] Carol Duncan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台北：遠流出版社，1998），頁6。

[11] Carol Duncan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該書第三章中提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建立的動機，可與之相發明，19世紀末的美國城市資產階級認爲建立歐洲式的博物館有如爲其城市加冕。

力建立與歐州各國相仿的現代化博物館。[12]

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亦爲新博物館學關切的議題，晚近的研究並特別注意展示的方法與展示所蘊涵的脈絡與觀點；展示並非單純陳列物品，供觀眾參觀，在陳列的背後往往隱藏著一個主題或敘事大綱，展示依此安排大綱陳列物件，展品與主題的選擇取決於博物館館長或館員，受其意識型態或立場所左右。[13]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既以展示台灣爲要務，又深受殖民統治影響，官方色彩濃厚，是以其展示的脈絡與意識型態當與總督府一致。透過博物館的展示，日本殖民統治想傳達那些觀點與訊息，又是以何種方式傳達了它們？運用現有研究的基礎與新博物館學提供的新視角，本文對此課題作初步的嘗試，討論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展示的空間與展示的內容，及其欲傳達的訊息。

二、

1915 年 8 月，台灣總督府博物館遷入以「故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爲名，由官民捐款完成，座落於台北新公園內米白色圓頂的希臘多倫式的新建築物。在殖民地台灣建立博物館的計畫，可說於此時徹底完成。

該建地原爲台北天后宮。自小在台北長大，曾任台灣總督府博物館館長的高橋秀人回憶建館前的景況：「現在的台北新公園草原一片，數處有竹叢，水牛在水塘裡玩水；現在的博物館的地方，有一棟大老舊的天后宮。」[14]

舊信仰中心天后宮被拆除，換成了有著高聳柱子，巨大圓頂的博物館；而有著竹叢水牛的草原變成有噴水池音樂台椰子樹的新公園，這樣的空間景象轉化，加上博物館周邊建築的連結，更凸顯它在殖民統治中的位置：以博

---

[12] 李子寧亦持相同意見，關於日本對其治台成果之宣傳，可參見吳文星，〈新渡戶稻造與台灣治台之宣傳〉，收入《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國立大學歷史學系，1992），頁32-41。

[13] 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空間展望》，頁11-14。

[14] 高橋秀人，〈斷想〉，收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369。

C.E.P.S.

物館前門爲基準，向前可連結至台北火車站、三線路等交通樞紐，向後則憑藉著新公園，可與總督府、總督官邸、台灣銀行等殖民權力核心相鄰。

在建築形式上，除了是日本殖民西式建築代表外，[15]也是一棟典型的西式博物館建築。如與當時日本同時期的地方博物館相較，[16]在規模與樣式上，遠較它們來得氣派外，也比其中任一都更像歐美的博物館。

在 Duncan 對博物館建築式樣與其意義的分析中，她指出博物館從 18 至 20 世紀中葉以來在外型上臨摹王宮或廟宇，爲世俗性知識的殿堂，最爲普遍的式樣如慕尼黑舊畫廊或大都會博物館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模仿希臘羅馬廟宇的建築，藉由古典廊柱、圓形大廳等建築元素表徵其價值，成爲與日常生活隔離的特殊空間。[17]若以 Duncan 的討論對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外型加以檢視，則發現其所列舉出的特徵，不論是多級的階梯、希臘神殿式的柱子、挑高大廳、與公園相連等，在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皆能明確對照，在歐洲形塑聖殿的要素也反映在這裡。

參觀博物館的規則也相似，在〈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規程〉中對於觀眾的要求有六條：不得牽動物或攜帶杖傘行李入場，小型手提包不在此列；不得拒絕警衛檢查其攜帶品；不得觸碰陳列品；若有毀壞陳列品，需依價賠償；不得在館內抽煙喀痰或有喧嘩粗暴的行爲；如有擾亂場內秩序者或有這種可能者，得不予入場或要求退場。[18]

這些規定遠較當時歐美的博物館嚴苛，館員甚至有檢查及驅離觀眾的權限。嚴格規定觀眾在博物館中的活動，相對地更能加強參觀博物館的儀式性，並保持更沈靜更抽離的空間。在規程中並未明文說明，但在開放當天報

---

[15] 葉肅科，《日落台北城：台灣日治時代台北都市發展與台人日常生活（1895-1945）》（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頁150。

[16] 參見古賀忠道監修，《博物館學講座2日本と世界の博物館史》（東京：雄山閣，1988），頁71、82、83，大正時期日本地方級博物館建築之照片。

[17] Carol Duncan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頁18-29。

[18]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規程〉，收入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社會教育概要》（台北：台灣總督府，昭和13年），頁200。

紙上有這麼一項規定：爲了怕污穢或傷毀中央大理石，參觀者入館時一律要改穿草履，[19]這種「脫鞋」的儀式，或來自東方宗教的聯想也未可知，但這種區隔的舉動，將博物館的空間與參觀博物館的活動更加抽離現實時空。

若假想一個在開館當日前往參觀博物館的觀眾，當他脫去原先的鞋子，換上草鞋進入博物館，進入挑高的大廳時，大廳的四周是高聳對稱的長柱，腳下是裝飾精美的大理石地板，頭上是圓頂的鑲嵌玻璃，在兩邊的西式神龕中，矗立著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雕像，兩人身穿戎服，[20]由一個較高的視野凝視著觀眾。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於是成爲一個抽離的特殊空間。由建築的觀點，該館同時具備了殖民地政府公共建築物、西方風格的博物館及兒玉、後藤的紀念館三種功能與特質，又皆爲各類建物之典型，是以該館蘊含著較西方博物館或日本內地地方博物館更複雜而強烈的權威。

三、

三重權威賦予了作爲展示空間的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強烈的政治意涵，作爲殖民地政府公共建設、西方標準下的博物館或對台灣殖民統治地位特殊的兒玉、後藤紀念館，三者的交集爲相同的權力來源：台灣總督府。

定位爲「綜合博物館」，[21]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廣泛地收集陳列「有助於本島學術、技藝及產業之標本與參考品」供大眾閱覽。[22]自 1908 年開館至 1945 年間，陳列品的分類或有更動，除不定期舉行的特展外，大致仍可在以「台灣」的大方向下，將常設之陳列品分爲幾個類別：自然史（地質、礦物、植

---

19 〈博物館之一新〉，《台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21日。

20 《紀念博物館寫真帖》，（出版項不詳）。

21 幣原坦，〈博物館三十週年祝賀の史想〉，收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9；富田芳郎，〈博物館への期待を語る〉，收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103。

22 〈台灣總督府第八十三號訓令〉，1908年5月24日，轉引自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3。

物、動物等）、人類學（高砂族、土俗、華南南洋等）、歷史、產業（農業、林業、礦業、水產、工藝等，該類在 1917 年遷至商品陳列館）。[23]

產業類的收藏於 1917 年全數遷至總督府商品陳列館，而使總督府博物館早期商品陳列館性質漸退，成爲較純粹的學術性博物館，在剩餘的三大類中，關於自然史與人類學之收藏，已有相關研究，而與之連結的課題，如日治時期台灣學術、調查的研究亦有初步的展開，學者基本上認爲這類的標本收集展示與研究，強調殖民地的特殊性，不論是自然資源或住民文化，在協助殖民政府瞭解殖民地，以更有效地統治及利用殖民地及其資源的功能外，尚表徵著日本對殖民地物質的掌握與支配。[24]

這可以新博物館學對收藏展示之研究相發明，收藏在西方文化中爲一種宣示所有權、文化與真實的策略，而「真」、「稀少」、「珍奇」等則爲人類收藏時的原則，動機與人類對物質支配的慾望與炫耀有關。[25]

在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收藏與展示中，尚未有人討論的歷史部門，雖然在各種部門中，陳列品的變化並不十分突出，數量上也沒有取得特別的優勢，[26]乍看之下，也難以顯示出其較人類學或自然科學那般，對殖民統治有實質的功用與宣示，但我們若將之置於博物館的相關介紹中檢視，則會發現

---

[23] 李子寧編，《台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週年專刊》，頁117。關於館藏品分類變化與增加情形，可見該頁表三之統計。參見附錄一。

[24] 除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例〉，討論自然史外，尚有吳文星，〈日本據台前對台灣調查與研究〉，收入《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師大文學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與〈東京帝國大學與台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展望》（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23-40。討論人類學的有：陳奇祿，〈台灣的博物館和人類學之發達〉，《台灣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1958年第1期，頁1-8。該文對日本研究人類學有甚高評價，但丘延亮近來則由殖民統治的觀點加以檢討，見丘延亮，〈日本殖民地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讀與再評價〉，《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145-176。

[25] J. Clifford, “Collecting ourselves,” in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ed., Susan M. Pearce （NY: Routledge,1996）,p. 260。該論文集由不同學科角度討論收藏與展示的行爲。

[26] 參見附錄一。

歷史部所佔之篇幅與詳細度，超過其他各部。

在引導觀眾參觀博物館的《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這本小冊子裡，介紹了該博物館的重點收藏；導覽的敘述順序會引導觀眾依序參觀，而在這本小冊子中首先介紹的即是歷史部，或許即在引導觀眾由歷史部開始參觀，該部可說是博物館參觀路徑中的第一章。在比重上，這本小冊子僅有 25 頁，扣去照片與地圖，本文有 21 頁，介紹歷史部佔了 6 頁，與土俗部的 4.5 頁、南洋土俗部的 1 頁、動物部的 5 頁、植物部的 0.5 頁與礦物部的 2 頁相比，是說明篇幅最多的一部。由引導參觀順序與敘事比重來看，歷史部在該館佔有重要角色。[27]

相似情形也發生在《台灣時報》上由博物館員執筆介紹博物館的連載〈台灣博物館見物〉中，該連載持續兩年之久，而打頭陣的是當時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他介紹歷史部門連續六個月之久，在整個連載中持續的時間與所佔的篇幅爲各部門中最多。[28]

我們或可存著如此的假設：歷史部的展示在博物館當局眼中頗爲重要，值得首先、大幅而詳細的介紹，並需要比自然史與人類學更多的文字加以說明。藉由展示台灣的過去，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在歷史部是否試圖傳達其他的訊息？

不論是《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或《台灣時報》連載中介紹的物件，都可視爲是館方希望觀眾重視、去參觀的部分，基本上可說是館方觀點的參觀指南。以下將以這兩份介紹所列舉的物件爲基礎，與當時館方及學者的言論、日本研究台灣史的成果對照參考，尋求歷史部展示欲傳達的觀點與訊息。

展示是藉由物件的公開陳列以達到對參觀者溝通爲目的，而觀眾在博物館中觀賞到的展示、是博物館透過博物館過程所製造出的歷史與文化之知

[27]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台北：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協會，1937）。

[28] 山中樵，〈台北博物館見物〉，《台灣時報》，昭和8年10月號，頁157-161；11月號，頁128-132；12月號，頁130-133；昭和9年2月號，頁120-121；4月號，頁137-140；5月號，頁125-129，在這六個月的連載中皆介紹歷史部的重要收藏。

C.E.P.S.

識。博物館的空間有限，展示不能漫無目的，故傳統的博物館展示往往僅能表現一種觀點，一種敘事，在展示歷史時，則多呈現出館方權威式的觀點。[29]

任何博物館藏品都有其原始脈絡，即該物件尚未成爲收藏品前，於所屬時空中的社會、文化、歷史、科學等面象的意義與情境，一旦成爲博物館藏品，意味著該物件與其原始脈絡切斷，而博物館的研究與展示過程中，企圖詮釋藏品的意義，在展示歷史或展示文化的過程裡，是將這些「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物件「重新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在博物館中，即便要恢復物件的原始脈絡，也難免於重新賦予意義與連結。支配展示脈絡的是博物館的詮釋結構，具體反映出博物館的建館理念與內涵哲學，是博物館主觀的意識型態支配的結果。[30]

在這兩份介紹中的物件，也是敘事脈絡與意識型態的安排下，被賦予了新意義，依時間順序將它們列表（見附錄二、三），[31]隱約地呈現展示背後隱藏的脈絡與史觀。

在表中出現大量日本文物，佔總數一半以上，但這些日本文物未必全出現在 1895 年後，往往被置於台灣成爲日本殖民地前的其他時代中，[32]與館方的史觀及當時日人研究台灣史的成果，基本上是同樣的觀點與敘事大綱。台灣帝國大學首任教育總長幣原坦在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中，發表了一篇回顧台灣歷史以增加對台灣瞭解的文章，其中簡單地敘述了台灣過去的歷史，可以視爲館方觀點的表現，該文首先說明台灣地境險惡，遭長期棄置不理，乃因環境過於恐怖，但「日本入台後，聖威普照，這些恐怖解除消失了」。他強調日本治台使恐怖解除，成爲一個真正美麗的

[29] Gaynor Kavanagh, “Making Histories, Making Memories,” pp. 1-14.
[30] 呂理政，《博物館展示的空間展望》，頁65。
[31] 在此的時間分類，採取博物館自身的時間區分，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爲基準，分爲：史前時期、高砂國時期、荷領時期、鄭氏時期、清領時期、領台後。
[32] 筆者將這類文物以網點襯底。

C.E.P.S.

島，在此之前來台者，不過是冒險與取得物資，未曾加以經營。台灣最早的住民是高砂族，與高砂族最早接觸的是中國人與日本人，日本在台灣貿易獲利，引起荷蘭人的覬覦而在安平築城，強迫早來的日本人繳稅，而釀成濱田彌兵衛事件，不得不賠償日本人。驅逐荷蘭人的是國姓爺，文中先稱他爲「出生在平戶的田川福松」，再說明他後來被賜姓名爲朱成功的過程，他的政權並未持久，「清朝把國姓爺的子孫趕出去，將台灣佔爲清朝的領土後，也不圖謀島上的繁榮，反而多棄之不顧」，視台灣爲「流民的排泄口」，而清朝並未有效地統治台灣，由牡丹社事件可知他們視蕃界爲化外之地。[33]

全文顯現幾個認知：日本爲唯一有心經營台灣者；日本人與中國人同時與高砂族接觸，日本與台灣之關係密切，淵源由來已久，是以統治台灣之過程是合理、合法的。由附錄二、三中，可以看到許多與該文相對應的物件，諸如：倭寇圖卷、御朱印船許可、秀吉之高山國招諭文（秀吉即豐太閣）、（有馬晴信）高砂國遠征訓令書、台灣視察船掟書、博多末次家拋銀證文、濱田彌兵衛威迫圖、鄭成功畫像、[34]征台軍攻擊圖、歸順蕃社保護旗與模造旗、面桶、西鄉中將書翰等。

幣原之文寫於皇民化運動的時空中，他強烈的訴求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觀點並非特別泛政治，實與日本台灣史研究的觀點一致。誠如吳文星在〈日治初期日人對台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舉出日人之台灣研究有其特殊性，初期台灣研究在日本取台過程中扮演先導角色，其研究多顯示日本占台之必要與大勢所趨，在歷史研究中，不論是牡丹社事件後與台灣出兵相互應的《台灣紀聞》等書，或與中日戰爭爆發後出版，受到重視的《台灣志》，皆是如此。[35]

---

[33] 幣原坦，〈博物館三十年祝賀的感想〉，收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6。

[34] 博物館中收藏的鄭成功畫像爲日人所繪，原件在台灣神社。山中樵，〈台北博物館見物〉，《台灣時報》，昭和9年2月號，頁120-121；4月號，頁137-140。

[35] 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台灣史研究之展開〉，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7），頁1-30。

C.E.P.S.

其中偏重歷史的《台灣志》，其觀點與敘事與幣原坦所言十分一致，[36]幣原坦的言論或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觀點，可能多少受到他的影響，亦或是這套解釋台灣歷史的脈絡，爲日人之共識。

歷史部的展示便是以存在的文物（可說是證物），呈獻給觀眾。爲了強調日本與台灣的淵源已久，而將許多原在日本史脈絡中的物品，自原有脈絡中割裂，放置在殖民地台灣的博物館中，錯落與其他高砂國、荷蘭、明鄭或清朝的台灣文物，作爲日本在台灣過去的「在場證明」，彼此相串連成日人觀點的台灣史。

這種形式的展示，在某種程度上，違反了博物館收藏與展示的基本原則。即便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本身亦不諱言，館中許多歷史文物是複製品，例如豐臣秀吉的〈高山國招諭書〉、[37]或是有馬晴信書簡、博多末次家拋銀證文等。[38]以博物館收藏展示文物強調「真」的原則看來，[39]複製品的價值需打些折扣，但館方的介紹仍慎重其事，詳加說明，是否意味著這些文物的意義，非維繫在真品，而在其衍生的意涵與象徵，即使他們是複製品，仍是館中歷史部收藏中最重要的。

在台灣，這些文物的複製品不只一份，在台南歷史館中，也被視爲重要展覽品而詳細介紹，對照台南歷史館案內與總督府博物館案內，[40]可以發現他們的重疊度相當高，基本上是在同一套敘事結構下建立其歷史展示。

展示過去以對照現在，亦是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展示歷史的另一目的。幣原坦在其文末如此說：「考慮到以上各節〔筆者注：指前面所述之台灣過往〕，

---

36 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台灣史研究之展開〉，頁2。

37 台灣總督博物館編，《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頁2。

38 岩生成一，〈高砂時代日台交通新史料——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部新著陳列品〉，《科學の台灣》，創刊號（台北：台灣博物館協會，1933：11），頁12-13。岩生表示這些文件原件在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博物館中所展示的是其複製品。

39 J. Clifford, “Collecting ourselves,” pp. 263。參照Clifford歸納藝術文化類收藏展示模式之表。

40 〈台南市歷史館〉，《科學の台灣》，第6卷第1、2號（台北：台灣博物館協會，1938：4），頁43；〈台南市歷史館案內〉，《科學の台灣》，第6卷第1、2號，頁44-48。

台灣的確走上很幸福的徑路，將來也一定走上更多幸福的路。藉此時期，有望於博物館的是，要民眾思考台灣在日本入台以前與以後走了多少劃時代的繁榮之路。」[41]藉由展示過去以說明今日之進步，並非幣原坦一人的意見，亦同時可見於該論文集中富田芳郎、杉本良與松倉鐵藏的文章中。

「現在」在歷史部展示中，最爲接近的是 1895 年之後各種與台灣有關係的日本政治人物（皇室、總督或殖民官員等）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北白川能久親王的床鋪或兒玉源太郎的轎子等，這類物件的極致莫過於 1923 年 4 月皇太子訪問台灣，留下的物件，最後變成歷史部的展示：植樹使用的劏子與附屬台子、撞球桿、台灣料理餐具、紋章、指南針。[42]

四、

日治時期富田芳郎已注意到了博物館有其特殊的傳播功能，其宣傳效果較展覽會等短期活動有效，而建議台灣總督府博物館館方應善加利用，將台灣「濃縮呈獻給大眾」，甚至建議總督府應利用博物館來宣傳政令。[43]在數量與成長變化上並不突出的歷史部，卻受到館方介紹的重視，展示「過去」比展示擁有支配的物質，有更深的訊息隱藏著。以館方觀點呈現出的台灣歷史，是一個有日本人參與的過去，而且是一個終將導向日本治台合理合法的過去，一個可以印證當下進步的過去。

擁有「過去」詮釋權，雖也是殖民政府對殖民地能充分控制的一種表現，但如何詮釋過去與藉此傳達何種訊息更耐人尋味。富田建議總督府利用博物館宣導政令的意見，並非沒有根據，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參觀情形相當踴躍，遠超過台灣其他各博物館，觀眾的成分中本島人與內地人約各佔

[41] 幣原坦，〈博物館三十年祝賀的感想〉，頁9。
[42] 山中樵，〈皇太子殿下博物館行啓の盛儀〉，收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頁347-350。
[43] 富田芳郎，〈博物館への期待を語る〉，頁104。

C.E.P.S.

半數，據 1930 年代的統計，每年參觀者已約有十萬、二十萬人之譜。[44]

藉由物品的安排陳列，而展示一個蘊含著總督府觀點的歷史，雖然是簡化的、濃縮的敘事，在詳細度上遠不如製成書的各種台灣史研究，但能在短時間內將相同的訊息傳達給爲數不少的觀眾，可說是學術研究與社會教育間的一種有效連結。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歷史展示，於 1945 年後，由接收的國民政府加以改寫，當他們接收了這座包含著以日本爲核心展示歷史的博物館後，極力洗刷博物館的殖民色彩，[45]於展示歷史時，將日本與台灣的鍊結抽換，插入國民政府的歷史敘事脈絡：在台灣史中加入革命史，使台灣與中華民國革命的經驗能串連。[46]然而之後改名的台灣省立博物館，漸漸以自然史爲收藏、展示的中心，於 1962 年後已不再展示研究歷史。[47]

由於殖民地學術研究或博物館研究，台灣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限於筆者的能力，本文僅爲初步的嘗試，相關議題的研究仍有待深入討論。

---

[44] 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例〉，頁246-247。

[45] 陳兼善，〈台灣省博物館季刊發刊詞〉，《台灣省博物館季刊》，第1卷第1號，頁1。

[46]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丑微署法字第零零九六六號〈台灣省博物館組織章程〉，薛月順編，《台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三》（台北：國史館，1999），頁380。

[47] 台灣省政府五十一年九月十日府人丙字第五八八九六號令，轉引自李子寧編，《台灣省立博物館創立九十週年專刊》，頁99-101。

C.E.P.S.

附錄一：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歷年館藏品類別及數量統計[48]

年代	地質（地文）礦物	植物	動物	人類（蕃族、高砂族）	歷史（教育）	農業	林業	水產	礦業	工藝（工業）	貿易	華南（南支）南洋	雜	合計
1908	906	3998	3722	712	100	1811	455	179	372	152	316			12723
1910	-	-	-	-	-	-	-	-	-	-				19000
1911	-	-	-	-	-	-	-	-	-	-				20000
1912	-	-	-	-	-	-	-	-	-	-				23970
1913	-	-	-	-	-	-	-	-	-	-				24204
1914	1618	1906	12578	1903	1042	800	621	92	7	2829				23396
1915	1623	1906	12619	1932	1044	719	507	93	7	2818				23268
1916	1626	1906	12619	1932	1050	741	507	93	7	2819				23300
1917	1260	1906	4105	1650	1085	181	120	102	44	381				10834
1918	1285	1906	4115	1649	1181	182	120	93	44	374				10949
1919	1285	1906	4115	1649	1181	182	120	93	44	374				10949
1920	1329	-	4092	1663	1408	119	86	90	-	295				9082
1921	1329	608	4099	1686	1551									9273
1922	1329	-	4246	1742	1684								569	9570
1923	1435	-	4180	1441	1790							337	422	9605
1924	1438	-	2357	1419	1790							354	249	7607

[48] 李子寧，〈殖民主義與博物館——以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爲例〉，頁251。該表參考台灣總督府事物成績提要與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C.E.P.S.

1925	1263		2392	1427	1786							325	280	7473
1926	1276	-	2393	1418	1787							473	273	7620
1927	1276	-	2391	1435	1800							473	273	7648
1928	1276	-	2412	1468	1801							473	273	7703
1929	1276	-	2481	1462	1817							771	383	8190
1930	1794		2512	1647	2266							828	366	9413
1931	1801		2461	1637	2455							1126	376	9856
1932	1823		2479	1656	2496							1126	376	9956
1933	2017	350	2809	3049	2646							1149	339	12359
1934	2134	382	3437	3071	2692							1149	341	13206
1935	2526	389	3440	3068	2873							1156	286	13738
1936	2202	391	3479	3077	2825							1188	286	13448
1937	2225	448	3516	3074	2876							1190	286	13615
1938	2267	4996		3162	2910							1129	180	13615
1939	-	-		-	-							-	-	14744
1940	-	-		-	-							-	-	15183
1941	-	-		-	-							-	-	14871
1942	2330	5024		3194	2935							1239	201	14923
1943	2330	5024		3194	3935							1239	201	14923

（-表示缺少該項數據，空白表示該年無此項）

C.E.P.S.

附錄二：〈博物館見物〉歷史部介紹整理

所屬的歷史斷代	展示物件
日領時代	兒玉總督乘坐過的轎子
日領時代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御寢台
日領時代	大肚溪畔的北白川宮（石川欽一郎繪）
日領時代	北白川親王詩歌
清領時代	古機關車「騰雲」與「A3」
清領時代	西鄉都督之書翰
清領時代	日章的保護旗與面桶
清領時代	康熙時代的台灣繪圖
清領時代	施琅平台紀略碑拓本
清領時代	平定台灣得勝圖
鄭氏時代	龜之碑拓本
鄭氏時代	鄭成功畫像
荷領時代	台灣蕃領文書
清領時代	番子田古碑斷片
清領時代	石炭密掘禁止之碑
高砂時代	豐太閣高山國招諭文書
高砂時代	有馬晴信高砂國遠征訓令書

C.E.P.S.

附錄三：《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案內》歷史部介紹整理

所屬的歷史斷代	展示物件
先史時代	貝塚石器：彌生式石器
高砂時代	倭寇圖卷
	御朱印船許可
	秀吉之高山國招諭文
	高砂國遠征訓令書
	台灣視察船掟書
	博多末次家拋銀證文
荷屬時代	蘭人澎湖島登陸圖
	熱蘭遮城完成著色圖
	領台時熱蘭遮城
	安平附近地圖
	赤崁係照圖
	總督肖像
	各蕃社戶口調查書
	新港蕃語物價表
	漢蕃對譯契字
	濱田彌兵衛威迫圖
	台南古圖
	英國領事館寫真
	蘭領時代基隆社寮島圖
鄭氏時代	蘭人代表二人與鄭氏會面交涉圖
	巴達維亞城來援艦隊攻擊鄭氏軍隊圖

C.E.P.S.

	熱蘭遮城開城條文
清領時代	台灣古地圖
	岸裡社頭目敦仔畫像兩幅
	清朝台灣土匪爭討圖
	乾隆敕建台灣評定碑文
	征台軍攻擊圖
	歸順蕃社保護旗與模造旗
	面桶
	西鄉中將書翰
	劉銘傳畫像及筆跡
	劉銘傳鋪設鐵路之一端
	古機關車第一號及第九號（騰雲與 A3）
領台後	台灣叛徒之國旗（台灣民主國國旗）
	劉永福像及諭示
	皇軍澳底登陸寫真
	台北入城光景
	能久親王澳底登陸圖
	三角湧血戰錦繪
	宮殿下彰化城御征討圖
	宮殿下御使用之御寢台
	樺山總督領台諭示
	伊藤首相訓示
	伊澤元學務部長官服
	六士先生血染名刺
	兒玉原總督與後藤原民政長官銅像
	兒玉總督乘坐之轎

C.E.P.S.